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專刊(1)

論“紅樓夢”

何其芳 著

I 207.411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專刊(1)

論“紅樓夢”

何其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811501

P182

412

(1) 許事浪浪得年文詞學將國中

楚辭集

卷之四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003号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935 字数143,000 开本350×1168 1/32 印张6 1/2 插页2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4) 0.65元

序

1953年2月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我打算研究中国文学史。当时正准备纪念屈原，我就从研究他开始，写出了我的第一篇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接着研究宋玉，但没有写文章。后来又研究“诗经”。历时数月，还没有把它的面貌和问题弄清楚，“红楼梦”研究批判就开始了。紧接着是批判胡适和胡风的运动。以后，我的研究计划改为研究清初的小说，写出了关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论文。“论‘红楼梦’”是我写议论文字以来准备最久、也写得最长的一篇。从阅读材料到写成论文，约有一年之久。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我还兼作行政工作，我的一年实际上不过有四五个月的研究时间。初来文学研究所的时候，我曾象学校里排功课表一样，规定一周里面哪几天处理行政事务，哪几天从事研究工作。结果证明行不通，总是把研究时间挤掉了。后来才摸到了这样一个规律：白天作行政工作，晚上读书或写作。对“红楼梦”这样一部巨著，仅有一年而且实际上不过是四五个月研究和写论文的时间是不够的。但在我已经是准备最久了。在这以后，还写了一篇关于“琵琶记”的文章。由于对它的评价很有分歧，我曾把这部作品读了五遍，并且浏览了所有的争论的材料。至于也收入了这个集子的关于李煜词的发言，却是在开讨论会的过程中匆促准备的，说不上研究。

岁月不居，时节若流，五年来我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不过如此而已。

我国文学的传统十分长久，十分丰富。对于企图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的人說来，‘它几乎到处都是有待于开垦的处女地。它要求我們辛勤地工作，要求我們有严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离开了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主观主义。任何形态的主观主义都是直接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們都还记得，解放后不久，古典文学研究中曾經出現过简单粗暴的傾向，那就是把过去的許多杰出的作家和作品一概划归剝削階級的正統文学的范围，加以否定，只承認古代的人民群眾的作品和从下层出身的作家的作品是我們应当寶貴的傳統。这种傾向受到了批評。这完全是必要的。古代的人民群眾和从下层出身的作家的作品，我們当然應該充分重視；但把它們去和另外一些杰出的作家的作品对立起来，那就不对了。象屈原、司馬迁、李白、杜甫、关汉卿、王实甫、吳承恩和曹雪芹这样一些大作家以及其他杰出的作家，尽管他們大都出身于当时的剝削階級，尽管他們的作品还有由于时代和階級的限制而产生的缺点，那些作品却在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人民的要求，而且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以至整个过去的文学的最高成就，我們的文学史是不能把他們抛开或者故意压低的。他們的作品同样是人民的財富，同样是我們应当繼承的傳統。在“屈原和他的作品”里面，我就是同样肯定了古代社会里的被压迫被剝削的人民的文学和从古代統治階級內部分裂出来的心怀不滿并有所批判的作家的文学，認為它們是我們古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两个来源，并且从屈原这个具体的作家說明了他和人民相通之处。但是，由于简单粗暴的反历史主义的傾向早已受到批評，这五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主要傾向却是另一个极端，却是从簡單否定轉变到簡單肯定，却是

无批判地肯定和牵强附会地肯定。李煜詞和“琵琶記”的討論异常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种傾向。尽管李煜詞的思想性并不怎样高，尽管“琵琶記”有那么濃厚的封建道德的色彩，許多人却硬不准許說它們的消极方面，硬要用种种离奇古怪的說法来强为辯解。我的关于李煜詞的发言虽然是匆促准备的，說不上研究，我还是把它編入了这个集子，用意也在此。这个发言发表以后，有些作者非难我引用李煜詞的某些有代表性的句子來說明他的亡国之恨的内容。如果这种引用符合实际，又为什么不可以呢？引用那些句子的时候，我說过那只是“大致是这样一些”。即使还講得不細致，难道主要的内容不是那些嗎？有的作者說主要内容不是那些，而應該是“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之类^①。李煜为什么悔杀了潘佑、李平？还不是因为不听他們的話亡了国，由江南小皇帝的身份“一旦归为臣虏”。完全不顧李煜詞里面明白表現出的内容，硬要否認他亡国以后还留恋他作小皇帝时的生活，断定他的亡国之恨只是抽象的“对于故国的深切怀念”^②，这就好象人的意識可以和他的生活不相干了。有的作者还責备我那些引用削弱了艺术形象的客觀意义^③。但我那并不是在分析他的某一首詞的形象的客觀意义，而正是在說明李煜的亡国之恨的主觀内容。在后面我是講到了他有些作品概括性很高，因而能够引起許多和他的生活并不相同的讀者的共鳴的。即使还講得不够，这难道不是已經說明了某些作品的客觀意义大于作者的主觀思想嗎？

“儒林外史”、“紅樓夢”和李煜詞、“琵琶記”不同。它們的积

①、② “李煜詞討論集”144頁。

③ 同上 142 頁。

极意义远为超过了它们的消极的成分。然而就是对这两部比较好肯定的作品也发生了牵强附会地肯定的现象。我在“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的“后记”里面，批评了所谓反满的民族思想说。想不到这种完全是学术讨论性质的批评却引起了有的作者的不满。一年以后，吴敬梓的“金陵景物图诗”被发现了。这些诗里面有明显的歌颂清朝的句子。这算是由“儒林外史”的作者自己出来作了结论。在“论‘红楼梦’”里面，我也批评了从过去到现在的种种牵强附会的肯定派。但关于曹雪芹，我们却很难找到有关他的思想的新材料了。

我是按照我的理解来努力提倡研究工作中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各种各样的主观主义的表现的。封建社会的学者的牵强附会，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庸俗社会学倾向和教条主义，从认识论方面说来，从思想方法方面说来，都是主观主义的；但从立场和观点方面说来，它们却又各不相同或不尽相同。比较更多地从方法论方面着眼；尽管我们和资产阶级学者在方法论上的分歧也是学术工作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表现，然而我并不曾一开头就这样明确地提到理论的高度；党所发动的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虽然我也曾努力参加了，然而在这以后我并不曾更多地更集中地批评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仍然是比较分散地就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论发表意见——这些都是我的理解和水平的限制，都是我的这些论文的缺点。

我之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学史，最初的出发点倒是为了现在的。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放弃了我所比较熟习的创作，开始从事文学批评。后来深感到没有研究过我国的和世界的文学史，仅仅根据一些已成的文艺理论和当前的文学现状写批评文章，很难写得深入，很难对于理论有所

丰富和发展。我又还感到我国文学史上的許多杰出的作品还不曾得到足够的估价,科学的說明;如果在这方面能研究出一些結果来,对于創作,对于文学爱好者,以至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都会大有益处。我是抱着这样一些想法来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的。然而等到真正开始了工作,大量的材料占据了有限的精力,時間一久,就对于当前的創作情况日益生疏了。这一次的全国整风运动开始以后,特别是在文学研究所討論方針任务的时候,我才感到这样下去不行,这会离开了我的最初出发点。到了“厚今薄古”的方針提出以后,問題就更清楚了。按照我的理解,“厚今薄古”是对整个学术界提出的,是为了糾正学术界的脱离革命实践、脱离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生活、很多人只喜欢討論古代的事情的偏重于研究古代的风气。这种不正常的风气虽然不是近几年才有的,近几年来却的确相当瀰漫。不少年輕的同志也是对于古代兴趣很濃而不愿意研究现状。这的确需要大喝一声。正常的情况应当是研究当前的問題的人較多,研究古代的事物的人較少。当然,就是这种风气糾正以后,就是学术界的力量的分布比較适当以后,仍然是会有一部分人去研究古代的事物的。对于这一部分人,研究古代的事物是他們的业务,他們又怎样“厚今薄古”呢?他們对于他們的业务不是一个“薄”的問題,而是应当“古为今用”,而是应当用正确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去研究,而是研究的結果应当符合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我們提任何問題,都是有一定的范围的,都是有一定的目的的。把“厚今薄古”的范围和目的弄乱了,那就会永远夹纏不清了。所以,应用到文学研究工作方面来,“厚今薄古”首先也是要改变风气和加强对于当前文学的研究。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的結果,对于我們今天的文学运动,到底还是只能作为借鉴。封建社会的文学

發展的規律，並不適用或者並不完全適用於今天的文學。要找出能夠指導我們今天的文學發展的規律，還是主要要研究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史，還是主要要總結無產階級領導的文學運動的經驗。其次，研究古典文學的人也應當注意當前的文學運動，注意當前的創作和批評，注意廣大人民的需要，以便使自己的工作能夠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厚今薄古”，絕不應該理解為對於古代的傑出的作家可以隨便否定，隨便貶低。解放後不久出現的那種簡單粗暴的反歷史主義的傾向是不應該重複的。

五年來我僅僅寫了這樣幾篇關於古典文學的文章。另外有些批評論文，其中也還有談到古典文學的，然而那是以批判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和文學思想為主，我都編入另一個集子“沒有批評就不能前進”裡面去了。文章寫得這樣少，而且又有上面所說的缺點，但在整風初期大鳴大放的時候，居然還有作者說我是“上下古今都要去談”，是要“作結論”，而且“這種做法”好像已經“在工作上風氣上”產生了很壞的“影響”^①。有一位作者還說我研究的作家和作品都是“大家寫過較多的文章的”，“很少看見”我“獨自對某一個問題寫出什麼研究的文章來”^②。好像文學史上的傑出的作家和作品，文學理論上的重要的問題（這些都必然是前人寫文章較多的），我都不應該去研究；而且我們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大量的占有資料就等於大量的抄襲，唯有無的放矢，信口開河，那才算得是“獨自”的“研究”了。我這幾年來寫的文章裡面，曾在某些古典文學的問題上批評過一些作者，其中不滿和不快的或許還不只是一二位。對於不承認批評和辯論是發展

①、② 見“文藝報”1957年第8期上吳組綽的“我的一個看法”，同年第9期上“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阻礙着文學研究工作的開展”中的林庚的發言。

学术的必要的、而把批评看作是“谁出来就打谁一棒”、或者甚至认为“被批评就是灭顶”的人，对于不许“百家争鸣”、只许自己“一家独鸣”、并且企图把他的“权威”建立在不被批评之上的人，你批评了他就是犯了最大的错误。但是，我希望经过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学术界的批评和辩论的风气能够大为开展，大为健全。凡是在某一个学术问题上受到了批评而自己不以以为然的人，就直接在这个问题上发表反批评，而不要用“作结论”、“排斥和打击”“老一点的专家”以及其他用意在于吓唬人的话来阻塞批评。我一直是期待着学术上的认真的批评和反批评的。

1958年8月7日晨7时

目 次

序.....	1
--------	---

屈原和他的作品.....	1
--------------	---

吳敬梓的小說“儒林外史”.....	27
-------------------	----

关于李煜詞的討論.....	52
---------------	----

論“紅樓夢”.....	61
-------------	----

“琵琶記”的評價問題	171
------------------	-----

屈原和他的作品

毛澤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面說：“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新民主主义論”里面他又說：“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創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毛澤东同志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并且告訴了我們整理古代文化的目的和作法。中华民族是一个偉大的富于創造性的民族，又具有悠久的历史，因此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卓越的貢獻。我們應該很好地認識这些貢獻，这样来提高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加强我們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古代的灿烂的文化对于我們意义还不止于此。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我們要建設新中国的文化，建設社会主义的文化，不可能从光秃的地面上开始，必須繼承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在人类文化的总宝庫中，帶有我們民族的特点，并且和我們現在的文化有血統关系的我們自己的过去的文化，无疑地更應該為我們所充分地理解和繼承。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毛澤东同志把它区别为封建性的糟粕和民主性的精华，这就又給予了我們一个理解和繼承的原則。毛澤东同志曾經反复地用列宁的这样一句話来教育我們：馬克思主义的最本質的东西，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在这里，他所分析的是封建社会的文化的总的情况。要把他的指示运用到古代文化的某一具体部門，运用到某一部門的某一具体对象，当然还有許多复杂的問題，还有待于我們的辛勤的研究。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方面，它的精华就是现实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傳統。中国文学里面的这种傳統是非常久远的。这是因为文学作品既然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随着文学的发生，就不能不有现实主义的发生。凡是真实地而不是歪曲地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的面貌和本質，就是我們所說的现实主义。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作品的基本內容仍然是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不过它們常常突破了当前存在的事物的限制，更多地表現了人类的合理的愿望，同时也更多地帶有幻想、夸大和奇特的色彩而已。正因为从真实地反映现实这一点說来，积极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根本精神上—致，所以在过去的許多偉大的作家身上，常常是现实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相結合的。大約在公元前 600 年到 500 年之間，和著名的希腊史詩“伊里亚特”和“奥德賽”的編定的時間相距不远，中国最早的一部詩歌选集就出現了^①。这部选集后来被称为“詩經”。在这

① “伊里亚特”和“奥德賽”据說編定于公元前 550 年。“詩經”編定的年代沒有明白的記載。孔丘刪詩之說大概是靠不住的。但孔丘說过“詩三百”，“誦詩三百”，和“詩經”的篇数相合，可見它在孔丘的时候或者更早的时候已經編定。又，“詩經”里面最晚的作品是公元前七世紀的作品。根据这种情况，我們推斷它的編定年代大約在公元前六百年到五百年之間。

保存了三百零五篇差不多都是无名作者作的詩歌的集子里，虽然有一部分歌頌或娱乐当时的統治阶级的作品，更多的却是古代人民对于他們的劳动、爱情和被压迫被剝削的生活的歌唱，以及当时統治阶级里面某些心怀不滿的知識分子对当时的政治或社会所发出的怨言和批評。后两类作品，在基本精神上都可以說是现实主义的。这种情况很值得注意，它不仅表明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傳統的悠久，而且清楚地告訴了我們古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两个来源。古代社会里的被压迫被剝削的人民，虽然被剝夺了享受整个社会的文化的权利，由于现实生活的激发，不能不产生用文学来表达他的苦痛、反抗和其他生活中的遭遇的要求。即使他們連文字也不能运用，仍然可以产生口头文学。經過了文字的記錄或加工，这种口头文学的一部分同样可以长久地保存到后代。这样的作品，既然是从被压迫被剝削者的亲身感受和观察事物的角度来反映社会生活，就必然会或多或少地暴露出当时的社会的某些真相和秘密。另外，在古代統治阶级内部的某些比較有理想或者比較接近人民的知識分子当中，也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由于看到不合理的事实，并且自己也经历到不幸的遭遇，因而对他們自己的阶级的統治有所不滿、有所批判的作家。这些作家，和高尔基贊揚过的那些欧洲资产阶级社会里的现实主义作家有些相似，在不同程度上，“他們都是自己阶级的叛逆者，自己阶级的‘浪子’”。他們往往有很高的教养，又熟悉他們的阶级的統治情况，因此，他們的作品也常常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的某些真实的面貌和本質。这些作家，如果又能够从当时的民間文学吸取营养，他們的作品就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可以具有人民性。在中国古代文学里面，主要就是这样的两种作者的优秀作品汇合成了现实主

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巨流。

今年要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间举行盛大纪念的中国古代的诗人屈原，他继承了“诗经”和楚国的民间文学的传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的发展和创造，因而对后来的长期封建社会的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就是那种对于他们自己的阶级的统治怀着强烈的不满，作了尖锐的批判，并且在他身上结合了现实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的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

二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然而由于他生在 2000 多年以前^①，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的材料保存至今的却很少。如果我们给他作一个传记，几乎可以说越简单就可靠性越大，越详细就难免推测之词越多。

根据他的作品和最早的关于他的记载，我们知道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称为战国时期（公元前 403^②—221）的楚国的人。楚国曾经是所谓战国七雄中的最大的国家。它的疆域用现在的地名来说，曾经西边到达湖南沅陵县和四川巫山县，东边到达海滨，

① 屈原的生年没有明白的记载。“离骚”里面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郭沫若推算为公元前 340 年正月初 7 日（“屈原研究”）。郭沫若的算法，他在“屈原考”（见“今昔蒲剑”）中有详细的说明。屈原的死年更无可考。郭沫若根据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说“哀郢”作于公元前 278 年郢都为白起所破的时候，并估计屈原就死在这一年（“屈原研究”）。

②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周威烈王 23 年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为战国时期的开始。周威烈王 23 年为公元前 403 年。

南边到达湖南九疑山，北边直到河南鄧城县和陝西洵阳县^①。屈原的活动时间正当楚国由强大轉为衰弱之际。他出身于楚国的贵族，曾經得到过国王的信任，任过重要的官职。他抱有政治理想。这种理想大致和以孔丘孟軻为代表的儒家的学說相近。然而楚国当时的統治集团不容許他实现这种理想。他受到了攻击和毀謗。国王不再信任他了。他非常孤立。后来竟被放逐，离开了国都郢城。他在当时楚国的一些比較偏僻的地方流落了許多年。他的足迹曾經到过現在湖北的汉水以北，湖南的沅水湘水一带。最后完全絕望了，他投入了洞庭湖东南的汨罗江。

这样一些事实在屈原自己的作品和最早的关于他的記載中大体上可以互相印証，因而是最可靠的^②。对于偉大的人物，我們总是愿意对他多有一些了解。象这样一点事实，的确太少了。但好在还有他的不朽的作品存在。关于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他引起后来人們热烈地同情和崇敬的原因，仍然可以从他的作品得到許多說明。

屈原的最重要的作品是“离騷”。它是中国最早的一篇規模

① “战国策”卷十四：“苏秦为赵合纵，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郢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卒千乘，騎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②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屈原任重要的官职和遭到毀謗，因而被疏，是在楚怀王在位的时候（公元前328—299）；投汨罗江自杀，是楚顷襄王在位的时候（公元前298—262）。这篇列傳还說到屈原曾使齐，并曾諫楚怀王不要相信張仪和秦国的欺騙。有些人根据这点記載說屈原是主張合纵的，并加以渲染夸大。为了抵抗秦国，屈原站在爱国的立場，固然可能主張爭取与国。但他和当时讲合从連橫的游說之士不同。他有更根本的政治理想。他在作品中着重說明的就是他的政治理想，而不是別的。

較大的詩^①。這篇詩敘述了他的政治理想，他的不為當時楚國的統治集團所容，並且說明了他對於理想的堅持，對於惡勢力的決不妥協；然後以種種想象和比喻來說明他的孤獨困頓，無人了解，達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在這種情形下，只有離開楚國才或許有出路；然而，當他在想象中開始了他的遠行的時候，他却是那樣愛戀他的國家，他的鄉土，他完全不能和它別離；於是他就想到了只有以死來殉他的理想。

在他的放逐生活中，屈原還寫了一些動人的短篇抒情詩。那就是“涉江”、“哀郢”、“抽思”和“懷沙”。這些作品描寫了他的放逐生活的愁苦和他對於國都郢城的強烈的懷念；反復表明他對於理想的堅持如故；對於當時楚國的統治集團作了比“離騷”更加激烈的批評；而在最後一篇“懷沙”中，更明白地說他已決心自殺，說他對於死亡並沒有什麼畏懼。

“九歌”是屈原的另外一類優美的抒情詩。它們大概是為當時楚國祭祀和娛樂鬼神而寫的歌舞詞。因為是歌舞詞，它們在形式上就比較句子短，比較更精煉。因為是用來祭祀和娛樂鬼神，它們在內容上不可能再是屈原自己的遭遇的抒寫，而必須適合各種不同的鬼神的身份^②。這些歌舞詞共11篇。前10篇分祭十種鬼神，最後一篇大概是祭祀完畢時的一個合唱。這些詩歌值得我們珍愛，是因為雖然當時直接的寫作目的是祭祀和娛樂鬼神，屈原卻在它們里面織進去了他的優美的想象，他的對於人生的體驗，而且藝術上是那樣成熟。

內容和寫法更加特別的是“天問”。屈原在這篇作品里面一

① 據錢杲之“離騷集傳”統計，共三百七十三句（未計公認為衍文的“日黃昏以為期兮”二句）。蔣驥“山帶閣注楚辭”統計，共二千四百九十字。